

别后以什么面目相见

■罗崇贵

内容更丰富
下载更方便

欢迎关注“八一评论”微信公众号



八一时评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明天，就是中秋节了，圆圆的月亮将升起在深沉的蓝宝石般的夜幕下。

一轮满月，象征团圆。在中国的传统文脉里，没有哪个节日比中秋节更多地被赋予团聚的意义。

明月如有诗，月明如有情。月亮、月色，在不同的人心中，往往有不一样的感怀。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，呈现的是一幅美丽而辽阔的画卷；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传递了普天之下人们对团圆的期盼之情；“与天地分此寿，与日月分此光”，展现的则是真诚热烈的爱国热忱；“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”，既表达了戍边将士对和平生活的向往，也抒发了军人舍身卫国的共同情怀。

一样的中秋，不一样的守候；同样的月圆，别样的情愫。此时的军营，从遥远的边关，到热闹的城市；从海拔最高的哨所，到辽阔无际的海洋，也许，将士们有的正挺立在哨所的杨柳边，望着白云中穿梭的月亮，托月亮捎给远方亲人节日的祝福。或许，他们嘴里正哼着一首熟悉的歌儿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用悠扬的旋律传递着对爱人的思念。人们通过手机视频、电视画面等媒介可以看到，高原海岛、雪域边关、密林深处、城市街道……到处都有温暖的绿色。正是这一抹绿色，守护着万家团圆。

月是故乡明。此时此刻，长年在外的军人，虽然不能与亲人团聚，但吃一块老家的月饼，赏一下头顶的明月，听一声电话那头甜美的笑声，当皎洁的月光照耀着丰收的大地，老人与孩子们共享团圆的喜庆，无论红尘有多厚、戍边有多苦，都将一洗而尽，荡然无存。

有一种团圆，近在心底远在天涯。军人有家也有爱，人分两地心相印。家，永远是军人的加油站，永远是军人心灵的栖息地。但特殊的职业背景，注定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会与常人有所不同。军人以一抹绿色守护万家团圆，他们的亲人也以别样的情怀，抚慰着边关军人那颗思家的心。

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作为军人，他们更懂得“一家不圆万家圆”的含义，更懂得“大家与小家”的分量。大地睡了，森林还醒着；夜空睡了，星星还醒着。“岁月静好”的背后，有军人的守候，有军人的奉献，有军人的牺牲。

“只要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我而亮，边关风雪再大又如何？”这是挂在军人嘴边的一句话。对于中国军人来说，老百姓的灯火在哪里点亮，那一抹绿色就应该在哪里出现。我们在战斗中相互守望，在守望中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无论距离有多远，只要满月挂在苍穹，幸福就在我们心中升腾！我们从万家团圆中品尝甘甜，从人民安居乐业中感受价值。

头顶边关月，心系天下安。不必说军人辛苦，那是军人的职业；不必说军人寂寞，那是军人的情怀；不必说军人危险，那是军人的使命。祖国需要守卫，人民期待安宁。祖国的安宁，是军人最大的幸福；人民的需要，是军人最大的荣誉。苍穹之下，大地之上，不论你身在何处，那一抹绿色都会映照在你的周围。浓厚的情感将化作久久的凝望，滚烫的血脉将弥漫在紧张的战位。这一切，都将融化成巡逻时的高度警惕、哨位上的挺拔身姿，为你守候，为你祝福……

■罗崇贵

一抹绿色，守护万家团圆

(作者单位：军委训练管理部)

长城瞭望

人与人分别之后，有的永不能相见，大多数人还会再见。别后以什么样的面目相见，这是多数人未曾想的一个问题。

毛泽东同志1938年12月1日在抗大第四期毕业典礼、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第五期开学典礼上，两次向学员们郑重提出：我们要“订一个条约”，即“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”！

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？这有一个背景：当时，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，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侵华策略，对国民政府开始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手段。在抗战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，毛泽东提出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”来号召学员，含义是十分深远的。

对这一重大问题，毛泽东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：第一，“抗战到底”，是“永久奋斗，就是要奋斗到死”。第二，“永远”有多远，又要走向哪里？毛泽东说：“我们总是要达到抗战必胜与建国必成的目的”“为共产主义奋斗要一起达

到共产主义的胜利”。这一奋斗到底的革命信念，被毛泽东称为“革命的道德”“真正的政治道德”。

后来的实践证明，毛泽东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”的要求，高瞻远瞩，寓意深远，至今犹有教育意义。

“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？”的确，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，今天别离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再会时是什么时候、什么样子。在动荡战乱的年代，尤其如此。许多开始都是以革命者的面目出现，形势顺利的时候，他们前进着；处在十字路口时，他们就开始犹豫徘徊；当革命遇到挫折时，有的就背叛了革命、背叛了自己的初衷。这些人，不是坚定的革命者，而是摇摆分子；不是“永远”的革命者，而是暂时的革命投机分子。

真正的革命者，是永远以“革命者的面目相见”的。第一次相见是那样，第二次相见也是那样，最终相见还是那样；顺利的时候是那样，遇到挫折甚至失败时也是那样，他们永远不改革命者的本色与面目。就像赵尚志说的：在鲜血染成的党旗面前，轻易不要举起你的右拳，一旦举起来了，就不可以轻易放

下。他三次负伤，三次被捕，一次赴刑场陪决，两次被错误开除党籍，但他革命者的本色与面目从未改变。

石可破而坚不可夺，丹可磨而赤不可灭。方志敏身陷牢狱，坚守“我能舍弃一切，但是不能舍弃党”；谢觉哉从秀才到党员，坚信“我已以身许党”；罗瑞卿虽身处险境，也“宁可冻死饿死，绝不背弃共产党”；赵一曼面对屠刀，坚定“我的主义、我的信念，绝不更改”。纯粹的革命者，不分顺利与挫折，不管成功与失败，信仰从不改变，血脉赓续相传，哪怕泰山压顶，无论风吹浪打。

留下来的都是最坚强的种子。在严酷的斗争形势面前，改变了“革命面目”的人不知凡几。但血与火的磨炼、生与死的考验，使革命者的意志更加坚强，信念更加坚定，那些意志薄弱者被不断淘汰，也因而使我们这个队伍更纯洁、更有战斗力。

我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打倒，有人却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。这些人当中，有的原来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，打过仗、负过伤，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过。但革命胜利后，便经不起诱惑，面目也随之改变，有的甚至变

得面目全非，由艰苦朴素变成了贪污腐化，由服务人民变成了以权谋私，由官兵一致变成了高高在上，由和蔼可亲变得面目可憎。这些中途变节、变质的人，与毛泽东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”的目标相差甚远。

一个人长时间不见面，突然一见，往往会脱口而出：“变了！”这个变，既有外貌与外表上的改变，也有思想与精神上的改变。但该变的变，不该变的永远不能变；其他的可以变，但本色不能变，初心不能变，革命者的面目不能变。为防止“不能变”的变了，解放后的徐海东将军，每逢有人来探望他，将军必问：“政治上犯错误没有？经济上多吃多占没有？生活上和老婆离婚没有？”

将军三问，一问思想，二问廉洁，三问作风。一个人变没变，从这三问中就可以问出个八九不离十。

现在，可能有人久已不闻“革命者”这个词了。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：“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”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，我们绝不能把天真的“诗人的幻想”，而应该永远做一个革命者，“永远以革命者的面目相见”。

(作者单位：武警四川省总队)

记住战士的名字

■惠凡芮 张仪璞

基层心声

某部一名机关干部到一个连队蹲点，几次碰到同一个战士。每次遇见他，都要问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这让这名战士感到很失落。

机关干部下到连队，要他们一下子记住每个战士的名字，似乎有点苛求。但如果在连队待久了，尤其是遇到同一个战士，还是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就有点说不过去了。另外，叫不上名字，也应以“同志”相称，不应以居高临下的姿态，张口闭口就是“你叫什么名字”。

记住战士的名字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关对基层、干部对战士的尊重与感情。机关干部下到基层，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了解基层、了解战士。所以，记住战士的名字，

是一个起码的、基本的要求。如果连战士的名字都记不住，何谈了解与理解？某部机关干部蹲点回来，汇报完蹲点调研情况后，一位领导问：“你能叫出多少战士的名字？”结果，有的叫出的多，有的叫出的少，少数干部只能叫出几个战士的名字。这位领导说：“尊重和了解战士，从记住战士的名字开始。”这一要求，提得很好。

当然，记住战士的名字，又不能止于记住战士的名字。记住是手段，了解是目的；记住是前提，服务是根本。记住名字是第一步，最终还是要把服务基层、服务官兵落到实处。只有前者没有后者，“记住”就没有意义了。

记住人的名字，显示了对他人的尊重。如果每次见面都拉着对方的手问：“你贵姓？”或者动不动就来一句“你叫什么名字”，无形中拉开了与战士们的距离，更不要说对战士真知、深知了。



前段时间，某部队体能考核发现，有的官兵体重超标。为了减肥，大家严控饮食，加强体能训练，减肥效果明显。同时也发现，个别人为快速减轻体重，从网上购买用脂机。这样并不能达到增强体质的效果，也对身体健康不利。连队干部发现这一问题，及

时制止，引导大家科学减肥。

这正是：
体重超标理宜减，
科学之法刻苦练。
急于求瘦搞用脂，
缘木求鱼不上算。
洛兵图 邓雅雅文

“三岁孩儿说得，八十翁翁行不得。”满嘴说大话，只说做不到的人，不分古今中外，没有人不讨厌的。

对这样的人，不论是普通的百姓，还是有良知的学者，攻击都是毫不留情的。明末清初学医出身的傅青主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有人把他的轶事编到书里，以问答的方式传递了他的思想。

有人问他，外间传闻的长生久视之术是怎么回事儿？傅曰：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王，长生久视，不过是像猪狗那样活着罢了。

又有人说他精通汉魏古诗赋。先生说：这都是些驴鸣狗吠的东西，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呢？

与那些敲骨吸髓、把那点“文字渣滓”看得跟珍宝一样的人不同，傅青主不认为这有什么用处，这是比较特别和少有的。他的话似乎说得有点过激，但推究起来却是不错的。

封建社会的君臣，是国家的象征。不能效力君王，就等于不能为国家社会做贡献。一介做官人，不能做点实际的事而只会吟风弄月，就会完全成为多余或是有害的了。如果能像苏轼、白居易那样，一边干着造福于民的实事，有时间再采点风、写点诗、作点词，亦没有什么不可以。

但古来的士大夫们，往往言行不一，只说不做。汉代出了一位大儒叫董仲舒，他说过两句话：正其谊不谋其利，名其道不计其功。因为他代表的是封建正统思想，所以这意思几乎统治了成百上千年，没有人敢说个不字。

这第一句话尚无大错，第二句话看上去似乎也有道理。假如用在研究上，这种

玉渊潭

知与行不可分作两事

■哲之

袁宏道说的：“眼世上学道者专一学说，殊不如田野老之近情也。”

有个笑话，说有一个呆子，其母患急病，求人想办法。人说，这只有割腹舍药才能救治。呆子说，这个不难。说完就拔刀而出，他看见有个人躺在街上，抓住腿脚就割起来了。卧者惊讶地叫喊起来，而呆子急忙捂住他的嘴说：“忍一忍吧！你不知道割腹舍药是很好的事儿吗？”

街上的人听了他的话，都一齐笑出声来。

编笑话的人评曰：“夫知救亲之为美，不自割而割人，宜人之不能听也。”

真是！有的人说话之所以“人不能听”，很大一个因素就是“不自割而割人”。

看了这笑话，觉得这呆子一点都不呆。行孝这样的好事自己做，割腹的痛苦留给别人受，正是这“呆子”聪明的地方。无奈现今这样聪明的“呆子”实在太多，我辈跟着他们吃的亏、受的苦也实在太多了。

《三国演义》第42回，写长坂桥张飞喝退曹军那一段，可谓气吞山河，壮丽无比。

罗贯中描写得好，而毛宗岗的评点尤有画龙点睛之效。他说：

“写赵云是几番血战，写张飞只是一声叱喝。天下事亦有虚声而可当实际者，然必其人平日之实际足以服人，而后临时之虚声足以耸听，所以张飞之功与赵云等。非若今人之全靠虚声，浑无实际也；人吃尽老力，我只出一张嘴。”

这是点到一些人的根子上了。

《甲申殉难录》载某公诗曰：愧无半策匡时难，惟余一死报君恩。近人洪允祥把诗采入《醉余偶笔》，说：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。然而，难道怕死是对的，天醉曰：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，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。

这里也是说得直接痛快，意思也清楚明了。

人活着，为做事。即使死，也不能死得太难看。以死尽责，不但死得没样子，死了以后也会留下骂名。

走是为了『打得赢』

■张西成

“你打我的，我打我的；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，是毛泽东同志对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。这四句话，既相互关联，又各有深意。即便在信息化战争的今天，依然是战争指导的“宝典”。

然而，与前三句话相比，“打不赢就走”似乎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。在一些人的意识里，一提到“打”，就必须每一仗都大胜而归，决不能出现别的结果。这作为一种精神来提倡，是应该的。但只要战争，就会有“胜”与“败”两种结果。只有把“败”考虑在前，消灭各种可能导致失败的因素，才能真正实现“打得赢”的目的。最近一位领导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：某些单位一搞训练就是进攻敌人，一谈情况就是优势兵力，训练场上有太多的想当然、片面性，想没想过怎么防御？想没想过敌众我寡咋办？想没想过一旦失利如何处置？

毋庸讳言，走向战场的敌对双方，谁都很不得一口吃掉对手。但战事难料，谁也不敢拍胸脯说一出战就百分之百能赢。孙子讲“百战不殆”，而不是说“百战百胜”，人们把能打仗的部队称为“常胜之师”而不是“全胜之师”，原因就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吃败仗的军队。能打仗的部队不在于全胜，而在于多胜；不在于不败，而在于如何败中求胜。

既然没有全胜之师，那么“打不赢就走”无疑是其中的选项之一。这种“走”，不是落荒而逃，一走了之，更不是放弃对胜利的追求，而是以退为进、为打而走，通过“走”来扭转颓势，创造新的战机。倘若战略全局需要，即使拼到最后一个人，也在所不惜；但若只是个人意气，那就得不偿失。

《斯巴达克斯》一书，描写过这样一个场景：沦为角斗士的斯巴达克斯，在一场惊险的团体角斗中，他的同伴一个个都倒下去了，而对方还剩三个人。就个人的斗技来说，斯巴达克斯是超人出众的。可是，在三个强手的联合攻击下，他寡不敌众，难以招架。此时，斯巴达克斯急中生智，瞅空子摆脱对方，拔脚就跑，三个对手穷追不舍。由于各人的运动速度不同，四人渐渐拉大了距离。突然，斯巴达克斯返身而战，迅速打倒了第一个追上来的对手，接着又打倒了第二个、第三个。很明显，斯巴达克斯正是通过“走”，把一场一对三的劣势，变成了三场一对一的优势，从而达到了战胜对手的目的。

一位军事专家提醒人们，信息化战场，总会有一些战机无法轰炸、坦克无法到达、电脑无法计算、精确制导无能为力，这些地方只能靠经验丰富的步兵装备着轻武器前去攻击。也就是说，无论科技如何发达，攻防交替、优劣转换、走打并举永远是战场上的常态。多练一练如何走出困局、走向胜局，其收获远比一攻就破、一打就赢要大得多。

(作者单位：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)

